

# 北宋经学史论

BEISONG JINGXUE SHILUN

高明峰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 北宋经学史论

BEISONG JINGXUE SHILUN

高明峰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责任校对：吕 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经学史论 / 高明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

ISBN 978 - 7 - 01 - 019507 - 0

I. ①北… II. ①高… III. ①经学—历史—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Z126. 27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4668 号

## 北宋经学史论

BEISONG JINGXUE SHILUN

高明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507 - 0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宋代经学著述汇考”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宋代经学史论”（编号L07DZS010）成果

# 目

# 录



<b>绪 论</b> .....	1
第一节 关于经学、儒学、理学等概念 .....	1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构想 .....	16
<b>第一章 中晚唐的经学新风</b> .....	20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现状与变革 .....	20
第二节 中晚唐的经学新风 .....	30
<b>第二章 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面貌</b> .....	67
第一节 北宋庆历以前的政风、士风与学风 .....	69
第二节 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面貌 .....	75
<b>第三章 庆历、熙宁间的经学新变</b> .....	93
第一节 庆历、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	94
一、“宋初三先生”与“明体达用” .....	95
二、疑传感经与通经致用 .....	111
第二节 欧阳修的经学 .....	123
一、疑传感经以尊经崇道 .....	124
二、弃章句、重义理与推人情、重人事 .....	131

<b>第四章 熙宁、靖康间的经学勃兴</b> .....	137
<b>第一节 党争、科举与经学</b> .....	137
一、熙宁、靖康间的经学实绩 .....	137
二、熙宁、靖康间的党争与经学 .....	139
三、熙宁、靖康间的科举与经学 .....	141
<b>第二节 荆公新学</b> .....	145
一、经学主旨: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 .....	146
二、经学特点:杂糅百家与解字通经 .....	153
<b>第三节 温公朔学</b> .....	158
一、《易》学:本数求义,切于日用 .....	158
二、《礼》学:参酌古今,修身治国 .....	166
三、《孝经》学:尊信经古文,补益先王道 .....	173
四、《孟子》学:疑孟求是,有激而发 .....	178
<b>第四节 苏氏蜀学</b> .....	184
一、怀疑经传与义理解经 .....	185
二、以权变解经,兼融佛老 .....	187
三、以人情解经 .....	190
<b>第五节 二程洛学</b> .....	192
一、经学旨趣:治经以明道穷理 .....	193
二、经学实绩:《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与“四书”学 .....	195
三、经学特色:以“理”解经和“六经注我” .....	198
<b>结 语</b> .....	201
<b>附录一 北宋经学年表</b> .....	204
<b>附录二 两宋经学著述考录</b> .....	246
<b>参考文献</b> .....	366
<b>后 记</b> .....	372

# 绪 论

## 第一节 关于经学、儒学、理学等概念

“经学”一词中的“经”，专指儒家经典。一方面，从“经”字的起源来看，甲骨文中未见“经”字，“经”、“絜”最早见于周代的金文。据郭沫若考证，“絜”乃“经”的初字，“象织机之纵线形”，而“经”字则是后起字。<sup>①</sup>按之《说文》：“经，织也。从糸，絜声。”<sup>②</sup>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作：“经，织从丝也。从糸，絜声”，并加注云：“从、丝二字依《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六补。古谓横直为衡从，《毛诗》云‘衡从其亩’是也，字本不作‘纵’。后人妄以代之，分别其音有慈容、足容之不同。《韩诗》作‘横由其亩’，其说曰：‘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由即从也，何必读如纵乎？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sup>③</sup>可见，“经”的本义是从（纵）丝，后引申为“经纬”，有天地万物之常理的意思。另一方面，从文献学来考察，“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作为一些重要的或者常用的典籍的称呼，正如《释名·释典艺》所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举例来说，在诸子百家书中，道家有《道德经》，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有《经上》《经下》篇，医家则有《黄帝内经》，就连兵家的著作也被称作“经”<sup>④</sup>，至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似乎是当时人所共同认可的经，据《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

① 参见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余释·释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4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1页。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644页。

④ 如《国语·吴语》：“挟经秉枹。”韦昭注云：“在掖曰挟。经，兵书也。秉，执也。”

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sup>①</sup>可见，孔子自称其所治《诗》《书》等为“六经”，而老子也予以赞同，并称其为先王之陈迹。尽管《天道》篇属外篇，出于后人依托，但也是战国时的作品。这就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孔子所研治的“六经”已经被当作“经”，并有了明确的记载。这在当时的典籍中也有反映，如《庄子·天道》云：“（孔子）翻十二经以说。”王先谦注曰：“《释文》：说者云《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sup>②</sup>在《荀子·劝学》中也提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王先谦注曰：“数，术也。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也。卢文弨曰：‘典礼疑当是“曲礼”之谓。’”<sup>③</sup>从这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是以“六经”为教的，而这“六经”又都是经过孔子修订过的。由于孔门弟子众多，使得孔子的学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于是，“经”一词就逐渐被用来专指经过孔子修订过的“六经”，后来就成了儒家经典的代名词。<sup>④</sup>

就儒家经典而言，其领域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在记载上每每有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及十四经、二十一经等”<sup>⑤</sup>，所谓“六经”，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本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批书籍，“《诗》是周代的诗歌总集，《书》是三代历史文献及部分追述上古史迹的材料，《礼》（《仪礼》）是西周、春秋时各国礼仪的记载，《乐》当有乐谱以教人音律、舞蹈方面的知识，《易》是古代占卜之书，《春秋》是鲁国的一种编年史”<sup>⑥</sup>。一般认为，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六经”存在了，但后世所传的“六经”又多经过孔子的整理或修订<sup>⑦</sup>。到汉代，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即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设

① 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95页。

② 王先谦：《庄子集解》，第85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页。

④ 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增订版）第841—845页对“经”的定义有详细解说，笔者亦有所参考。另外，周予同还提到历代儒家对“经”的定义有“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等说法，可供参考。

⑤ 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45页。

⑥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⑦ 参见吴雁南、秦学顺、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置博士，至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官学中废黜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博士官，从而确立了五经在官学的垄断地位，儒学遂定于一尊。<sup>①</sup> 后来，经书范围又不断增多，直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大略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sup>②</sup> 尽管“经”的领域不断扩大，甚至有“十四经”、“二十一经”之说，但按照普遍的习惯，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十三经”为限。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其中经部的书籍即是经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而其他史、子、集部的书籍中有关儒家经典的资料也属于经学的范围。

所谓“经学”，即指训释、阐述、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阐发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项：（1）校订、解释经典的词句；（2）阐发经典的义理；（3）研究既有的经学研究成果；（4）为了解释经典而进行的有关儒家学者的研究。”<sup>③</sup> 显然，这一基本任务和内容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为学理层面；一为致用层面。从整个经学发展史来看，经学在各个时期都有其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经学作为一种经典阐释学所不可避免的；但与之同时，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把经学作为统治学说来对待，以期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效，

① 据《汉书·武帝纪》。庄春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重新提出质疑，指出“汉武虽尊儒，却并未如董仲舒所期待的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为汉初置五经博士在元光五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则“在元光五年（前130）察举之后”。此处我们仍按照一般通行的说法。关于《乐》经的有无问题，今文学家认为“乐”本无经，“乐”就在“诗”与“礼”中。古文学家则认为乐本有经，后因秦朝“焚书”而亡佚了，可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47—848页。

②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页。

③ 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蔡方鹿认为经学“包括研究和探讨儒家经典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对经传文字、名物度数的训诂，对经传义理的阐释发挥，对经书的考据等，都在经学的范围之内。而对经学流派及各派理论演变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是与经学相关的经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亦可参考，见蔡氏《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4页。

这又是经学作为经世之学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的了。<sup>①</sup>

“经学”之名，最早见于《汉书》。<sup>②</sup>虽然在汉武帝时，经学才正式确立，然经学之实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门人对“六经”的整理和授受。毫无疑问，经学与孔子有着莫大的关系。孔子对“六经”的教化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论语·泰伯》有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史记·滑稽列传》中也提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sup>③</sup>《礼记·经解》亦记载：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sup>④</sup>

这里更是详细地记述了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教的认识，认为“六经”各有不同的教化功能，并指出如果存在

---

①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第2-3页）亦指出：“一般说来，经学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层面，古代经籍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已使后人难以读懂，需要经师加以文字训读；而经书中涉及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名物制度，也需要对之加以注解；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亦需经师作义理阐释。此外，关于经学学派、传承、演变的研究等等都属于学术层面。二是信仰层面，在古代，经典二字，不是可以滥用的，它特指圣贤所作之书，是人们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经’有‘常’的意义，是人类社会的常行之道；‘经’也有‘法’的意义，人们通常说‘大经大法’，即有必须遵照执行的意思。对经典尊奉是通过对经典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这属于信仰的层面，也可以说属于价值的层面”，与笔者所论相近，可供参考。

② 如《汉书·邹阳传》：“（邹）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汉书·兒宽传》：“（兒宽）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汉书·匡衡传》：“（萧）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汉书·张禹传》：“（萧望之）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等等。

③ 此处的“六艺”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8页。

缺失的话，就会出现愚、诬、奢、贼、烦、乱等弊端。正是由于孔子对“六经”教化作用的清醒认识，他平时在施教的时候，就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这在《论语》一书中多有反映<sup>①</sup>，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为了更好地教学，孔子还对“六经”加以整理、删定<sup>②</sup>，于是，这些经过孔子修订的“六经”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也因而使得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的产生成为了可能。由此可见，没有孔子，就没有经学，也正因为如此，皮锡瑞才把经学的开辟追溯到孔子整理“六经”：“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sup>③</sup>。

在另一方面，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儒家学说即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章太炎撰有《原儒》一文，认为“题名由古今异”，指出“儒”之名可分达名、类名、私名三者，具有广狭不同的三种含义，所谓达名，指的是“术士”；所谓类名，指的是“知礼乐射御书数”者；所谓私名，即指《七略》所说“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的“儒家者流”。<sup>④</sup>其后，胡适、郭沫若、徐中舒等人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意见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但章太炎的观点仍然是没被驳倒的、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意见。庞朴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儒学》对章太炎的观点作了很好的发挥，对于我们认识孔子以前的“儒”的概念颇有帮助：

孔子以前，“儒”之含义大凡三变：最早的“儒”可以追溯到殷商

① 如《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又如《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② 这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9—13页亦做了细致分析，可供参考。

③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19页。

④ 参考章太炎《原儒》一文，载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5页。

时代，当时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其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周灭商以后，除了继续以祭祀礼仪为职的“儒”，还出现了以教“六艺”为职的“儒”，他们隶属于司徒之官，系教官之属，而其所教则是“官府之学”。西周灭亡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动荡的春秋时代，随着当时周天子“共主”地位的沦落，“官学”系统瓦解了，学术开始下移，那些从事祭祀礼仪和以“六艺”教民的“儒”，分散于各地，其中较多的人集中在文化较发达的齐鲁之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从事“六艺”知识的教授，而更多的人则凭借自己熟悉礼仪的本领，从事赞礼、相礼，尤其是婚丧礼的职事。由于社会的急骤变动，汉语礼俗变迁，“儒”的社会地位大大下降。<sup>①</sup>

从这段话可知，“儒”者早已有之，随着社会的变迁，其从事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地位因而日益下降，其概念所指也越来越窄，由高贵的术士逐渐变为官学中乃至私学中以“六艺”教民的“师儒”。而孔子，即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个以“六艺”传授私学的“儒”者。由于孔子以整理过的“六经”为教材，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养出大批学生，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孔子去世后，其学生在各地传播、散布老师的学说，造成了普遍的影响。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与墨家是当时并称的显学，在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所谓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这种分化意味着儒学自身的发展及其深广的包容性，也为后世儒学在各个时期的演变提供了借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儒家经典取得独尊的地位，经学亦于此时正式确立，其情形略如《史记·儒林传》所云：“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故而皮锡瑞以为：“经学至汉武始昌，而汉武时之经学为

<sup>①</sup>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二），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页。

最纯正”，“经学至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sup>①</sup>以经学为依托，儒学也就不再作为先秦时诸子百家中一家而存在，而成为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的学说。<sup>②</sup>

所以，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所谓的“儒学”，即“孔子所创立，后儒所继承发展的以仁爱为核心、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sup>③</sup>，自孔子时起就已初步形成，而经孔子修订的“六经”，也成了儒家的经典，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逐渐定于一尊。这种情况，决定了儒学与经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其根源即在孔子及其修订的“六经”。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经学与儒学的关系：

首先，从各自的发展史来看，儒学的产生要略早于经学，孔子修订“六经”，以之传授门徒，形成了儒家经典和儒家学派，其后，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才得以奠基，其时在战国时代，直至汉武帝时期，“经学”才得以正式确立，与之同时，儒学也成了统治学说。其后，儒学即以经学为依托，或者说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而得到流传和发展，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儒学和经学也因为时代的需要而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如儒学在魏晋时期糅合儒、道而出现玄学，赵宋时期的儒、释、道融合而代之以理学，在经学方面则分别相应地出现经学的玄学化、理学化。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和儒学都不复存在，当下的经学主要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意义而存在，不再具有学术独尊的地位；而儒学则转型为现代新儒学<sup>④</sup>，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予以扬弃，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仍然有着根深

① 分别见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70页和第101页。

② 关于儒学以经学为依托，这在“二十五史”的“儒林传”中多有反映，其实早在《史记》和《汉书》《后汉书》的“儒林传”中就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如《史记》有《儒林列传》一卷，《史记正义》曰：“姚承云：‘儒谓博士，为儒雅之林，综理古文，宣明旧艺，咸劝儒者，以成王化者也’”，《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的“引言”则称“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

③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四），第5页。

④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四）第38页指出：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众多，按其年龄辈分、学术著作及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代与阶段。对此，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想法。一般认为，梁漱溟、张君勱和熊十力为第一代中第一阶段（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冯友兰、贺麟和钱穆为第一代中第二阶段（抗战时期）的现代新儒家；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则是第二阶段的现代新儒家；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为第三代即当代新儒家”。

蒂固的影响。

其次，就其内涵而言，经学主要是注解、阐释儒家经典，是为专门之学，掌握经学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儒学则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儒家者流的学说，其宗旨在于“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故而其内涵要比经学更为宽泛，除以经学形式出现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儒学的影响和渗透。

最后，从本质属性来讲，儒学作为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想，而经学的本质则是一种经典阐释学，只不过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儒家经典，故而其阐释也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特征，也即作为儒家思想的载体或依托而存在，这种存在方式，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经学的经世致用性。

故而，经学与儒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我们既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无视其明显的区别；又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开，割裂其有机的联系。

此外，“理学”一词的概念也值得辨析。与之相关的，是“道学”、“新儒学”、“宋学”、“性理之学”、“义理之学”等概念。解释这些概念，还得从经学史谈起。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经学就取得独尊地位，历时达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学可以有不同的分期，也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四库馆臣指出：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璜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

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sup>①</sup>

在这里，四库馆臣认为经学自汉代以来经历了六次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各有特点，也各有流弊，并归纳出经学流派可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且两派各有优长，汉学根柢扎实，宋学精微高明，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此种分法具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也是将经学分为汉学与宋学两派。<sup>②</sup> 应该看到，这种分法是有其合理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学史发展的面貌，然而，此处所谓的“汉学”，偏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实不能包括西汉的今文经学。除此“两派说”之外，还有所谓的“三派说”、“四派说”<sup>③</sup>，周予同则在前人分派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三派说”，即将经学分为“汉学”（包括今文学与古文学）、“宋学”、“新史学”等，并列表说明各派的开创者、特征及其流弊，认为汉今文学的开创者是十四博士及其先师，注重点是微言大义，特征是功利的，流弊是狂妄；汉古文学的开创者是刘歆，注重点是名物训诂，特征是考证的，流弊是烦琐；

①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② 笔者撰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述论》（《求索》2005年第2期）一文，对《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有细致分析，可供参考。

③ “三派说”和“四派说”都有多种提法，如持“三派说”的主要有：龚自珍分经学为汉学、宋学和清学（国朝学）；康有为分经学为汉学（专指西汉今文学）、新学（即新莽之学，指刘歆所兴的古文经学，包括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和宋学；王葆玟分经学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形上学化的经学（包括魏晋玄学、隋唐经学、宋代理学及明代心学等），并认为今文经学偏重信仰，形上学化的经学偏重哲学，古文经学则介于两者之间。持“四派说”的主要有：叶德辉分经学为今文学、古文学、郑氏（玄）学、朱子（熹）学等四派；刘师培按朝代先后将经学分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近儒（清）等四派；许道勋、徐洪兴将经学分为汉学系统、宋学系统、清学系统、晚清系统等四大系统。（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58—860页和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102—103页。）

宋学的开创者是北宋五子，注重点是理气心性，特征是玄想的，流弊是空疏；新史学的开创者是梁启超，注重点是思想体系，特征是批判的，流弊是武断。<sup>①</sup>综合以上各家说法，我们认为，划分学派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不能绝对化，任何学派的形成，都有其渊源，又必然地会产生种种或隐或显的影响。从经学史演变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唐是一个时期，以“六经”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字词章句的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以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为集大成的代表，可称之为“汉学”，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等派别；宋明又是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从对汉学的怀疑甚至否定开始，以南宋理宗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为分界点，逐渐由“六经”转向以“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心性义理的阐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集大成的代表，可称之为“宋学”，形成了讲求义理的“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和偏于性命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派别；清代自成一个时期，开端于对宋学的反拨，以“十三经”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强调章句训诂、名物考证，又不废心性义理的阐发，是对汉学与宋学的一次集成式的跨越，主要成果体现在《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中，可称之为“清学”，形成了乾嘉学派和清代今文经学等学派。<sup>②</sup>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理学”一词的概念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解释一个概念，我们不仅要考虑它在当下的使用环境，更要考察它所产生的环境以及自产生以来的使用情况，对于“理学”这样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概念尤需如此。

“理学”作为宋明间持续将近七百年的学术主潮，长期以来有多种称呼，

---

<sup>①</sup> 此种分派见于周予同所著《中国经学史讲义》（载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30—944页，据编者“增订版前言”可知，许道勋于1962年成为周予同的中国经学史研究生，《中国经学史讲义》乃是许道勋以其听课笔记为主，参照刘修明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一书的第五章“经学的学派”中。值得注意的是，周予同曾在《经学史与经学之派——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载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92—104页，据编者注，此文于1928年初次发表在《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一号）一文中将经学粗略地分为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三大派。故此，把经学分为“汉学”“宋学”“新史学”三派可视为周予同晚年的意见。

<sup>②</sup> 崔大华《论经学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指出经学“由其学术内容和方法的倾向或特色的不同，而显示的历史发展或派别更迭，还是比较清晰的。大体而言，可分为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阶段”，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103页）将经学派别“区分为汉学（汉至唐，包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等）、宋学（宋至明，包括理学和讲义理的非理物理学派等）和新汉学（清，包括乾嘉学派和清代今文经学等）三派，均与笔者所论相近，可参考。



或“道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如此等等。徐洪兴指出：“‘新儒学’一名，原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度采用，以后主要被海外学界广泛沿用，只是近十年来才在国内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究其含义，乃是指称宋代开始的、有别于先秦原儒、汉唐经儒的新的儒学形态。至于‘道学’、‘理学’和‘宋学’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旧有的名称，尽管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别。”<sup>①</sup>事实上，这些概念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解释，其内涵也多有交叉，而长期以来一直可以通用互换。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与“道学”。应该看到，“理学”之名始于南宋<sup>②</sup>，而早在北宋，“道学”之名就已出现<sup>③</sup>，二程兄弟及其门人即自称其学为“道学”；而且，宋儒以韩愈为旗帜，倡扬孔孟道统，“道学”之“道”与韩愈《原道》之“道”是有着历史渊源的。据此，冯友兰主张用“道学”而不用“理学”，他指出：“近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们，有用理学这个名称代替道学这个名称的趋势。这两个名词从清朝以来是可以互用的。理学这个名称出现比较晚，大概出现在南宋，我们作历史工作的人，要用一个名称，最好是用出现最早的、当时的人习惯用的名称。照这个标准说，还是用道学这个名称比较合适，这也就是‘名从主人’。而且用理学这个名称还使人误以为就是

① 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② 佛教中早有“理学”一词，乃佛门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的简称，如南朝宋时人宗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云：“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但与此处所指非一回事。

③ “道学”一词在北宋之前即已有之，关于其内涵及归属问题，今人颇有争论，有人认为与儒家学说有关，如章钊才指出：“考史，‘道学’一词起自汉代。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引了时人的议论，就有‘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才能尽于朝廷，此亦报上之效验’的提法。晋许穆之《孔门三子·子思子》中，也有‘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的提法，汉魏两晋之际，一些经学家和思想家已把‘道学’与思孟学派联系在一起……”（章氏《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有人则认为专指称道家、道教学说：“道学应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形成的学术系统，其中包括道家、道教、丹道三个大的分支，老子为道学之宗。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以前，道学这个词儿也专指老子道的学说而言。……黄宗羲尝云《宋史》立《道学传》乃‘元人之陋’，而后正史再无《道学传》。其实早在六朝时期陈代马枢就曾撰《道学传》二十卷，所收皆张天师、许迈、吴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有陈国符先生辑佚本转（当作‘传’）世。《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六年（1116）春‘置道学’，宣和元年（1119）五月‘诏德士（僧人）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将道教称为道学，元人将儒学称为道学乃名实不符之乱名。”（见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汤一介则在为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们不必过多地讨论‘道学’这一名称的归属问题，但这一名称指‘老庄道家’早于《宋史·道学传》却是事实。”